



湖北经济学院学术文库



中国所有制结构调整、 企业成长与地区GDP 水平变动研究

ZhongGuo SuoYouZhi JieGou TiaoZheng
QiYe ChengZhang Yu DiQu GDP ShuiPing
BianDong YanJiu

黄彬付宏◎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湖北经济学院学术文库

UF 中国所有制结构调整、 企业成长与地区GDP 水平变动研究

ZhongGuo SuoYouZhi JieGou TiaoZheng
QiYe ChengZhang Yu DiQu GDP ShuiPing
BianDong YanJiu

黄彬付宏◎著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所有制结构调整、企业成长与地区 GDP 水平变动研究/黄彬,付宏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11

ISBN 978 - 7 - 216 - 05750 - 9

- I. 中…
II. ①黄…②付…
III. ①经济结构—调整—研究—中国
 ②企业管理—研究—中国
 ③地区经济—经济发展—研究—中国
IV. F12 F279.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43862 号

中国所有制结构调整、企业成长与地区 GDP 水平变动研究 黄彬 付宏著

| | | | |
|-------|--------------------------------|-----|----------------------------|
| 出版发行: |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 地址: |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
| 印刷: | 湖北立龙印务有限公司 | 经销: | 湖北省新华书店 |
| 开本: |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 印张: | 9.75 |
| 字数: | 191 千字 | 插页: | 1 |
| 版次: |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 印次: |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号: | ISBN 978 - 7 - 216 - 05750 - 9 | 定价: | 20.00 元 |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目 录

| | |
|---|-----------|
| 第一章 我国所有制结构和企业成长的历史沿革与地区 GDP 水平变动 | 1 |
| 第一节 我国所有制结构的发展与变迁..... | 1 |
| 一、单一的所有制的形成 | 2 |
| 二、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发展模式的形成 | 2 |
| 三、多种所有制经济融合发展模式的形成 | 3 |
| 第二节 企业成长的相关理论..... | 4 |
| 一、新企业的起源 | 4 |
| 二、企业成长理论 | 6 |
| 三、企业的生命周期理论 | 7 |
| 第三节 我国主要地区 GDP 发展历程 | 10 |
| 一、首都经济圈 GDP 发展历程 | 10 |
| 二、长三角地区(上海、浙江、江苏) | 12 |
| 三、环渤海经济圈 | 21 |
| 四、珠三角地区 | 22 |
| 五、东北地区 | 25 |
| 六、中部地区 | 28 |
| 七、西部地区 | 31 |
| 第二章 我国各地区所有制结构和企业成长的特点比较与地区 GDP 水平变动 | 37 |
| 第一节 我国所有制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 37 |
| 第二节 我国所有制结构变化趋势分析 | 39 |
| 第三节 私营经济与我国所有制结构调整 | 45 |
| 一、中国私营企业成长的基本历程 | 45 |

| | |
|--|-----------|
| 二、私营企业的发展现状 | 46 |
| 第三章 中国企业成长的实证研究:来自中部地区的案例 | 57 |
| 第一节 中部地区中小企业发展现状 | 57 |
| 一、调查样本描述 | 57 |
| 二、华中地区中小企业发展的总体分析 | 60 |
| 三、华中地区中小企业创新活动的实证分析 | 62 |
| 第二节 创新活动的量化研究 | 66 |
| 一、变量定义 | 66 |
| 二、模型选取 | 67 |
| 三、分析结果及解释 | 68 |
| 第三节 企业成长过程中提升创新绩效的政策建议 | 69 |
| 一、健全创新服务体系,建立区域创新系统 | 69 |
| 二、加大企业创新投入力度,提高创新意识 | 71 |
| 三、加强对创新活动的控制和管理,提高创新绩效 | 71 |
| 第四节 企业成长的社会网络效应 | 73 |
| 一、企业社会网络定义 | 73 |
| 二、企业成长与社会网络 | 75 |
| 三、企业社会网络效应的量化分析 | 80 |
| 四、企业成长与社会网络关系的结论 | 83 |
| 第四章 地区 GDP 水平与部分地区经济发达、欠发达的原因探析 | 84 |
| 第一节 地区 GDP 水平及发展态势 | 84 |
| 一、东部 | 84 |
| 二、中部地区 | 85 |
| 三、西部 | 86 |
| 四、东北振兴 | 86 |
| 五、长三角与珠三角 GDP 增长 | 87 |
| 六、各地区地均 GDP 比较(万元/平方公里) | 88 |
| 第二节 我国发达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对比研究 | 93 |
| 一、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 | 93 |
| 二、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 | 94 |

目 录

| | |
|--|------------|
| 第三节 欠发达地区 GDP 增长缓慢的原因分析 | 94 |
| 一、所有制调整缓慢 | 94 |
| 二、产业分布和企业规模的约束 | 95 |
| 三、国家支持政策的约束 | 97 |
| 四、融资渠道和数量约束 | 98 |
| 五、市场主导型区域合作尚未形成 | 98 |
| 第四节 发达地区 GDP 得到较快增长的原因分析 | 99 |
| 一、所有制结构调整迅速 | 99 |
| 二、国家的政策支持 | 100 |
| 三、发达地区外部规模经济、产业集聚效应和整体竞争优势 | 100 |
| 第五节 欠发达地区非公经济发展的不利和有利因素 | 104 |
| 一、不利因素 | 104 |
| 二、欠发达地区非公经济面临快速发展的大好机遇 | 105 |
| 第五章 所有制结构调整、企业成长、资源配置与地区 GDP 水平 | 106 |
| 第一节 所有制调整深化是企业成长的根本和动力 | 106 |
| 一、企业成长中的产权制度缺陷、资源配置失效 | 106 |
| 二、家族企业制度 | 107 |
| 第二节 经济制度结构对资源配置效率和企业成长的影响 | 108 |
| 一、资源配置效率与经济制度结构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 | 108 |
| 二、经济制度结构对资源配置效率和企业成长的影响 | 108 |
| 三、企业成长的资源有效配置 | 110 |
| 第三节 有效资源配置的企业成长与地区 GDP 发展水平 | 111 |
| 第六章 所有制结构和企业成长战略性调整的政策建议 | 113 |
| 第一节 我国所有制结构调整的政策建议 | 113 |
| 一、实现更灵活的所有制结构，落实“非公经济 36 条” | 113 |
| 二、着重对欠发达地区非公经济进行联合改造 | 114 |
| 三、改进对民营企业的服务和监管 | 116 |
| 第二节 提升我国企业成长速度和质量的政策建议 | 116 |
| 一、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历史回顾 | 117 |
| 二、20 世纪 80 年代，理论界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讨论 | 118 |

| | |
|--|------------|
| 三、优化调整我国企业改制、改组..... | 121 |
| 四、依据地区特点，强化优势产业中的强势企业的成长..... | 121 |
| 五、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为企业成长创造良好环境..... | 122 |
| 六、加快企业成长，促进政策与体系建设..... | 123 |
| 七、成长性企业融资问题 | 124 |
| 八、培育产业集聚发展新体制 | 125 |
| 第三节 以所有制结构调整和企业成长为依托，提升我国地区 GDP 水平..... | 125 |
| 一、国家政策的地区针对性 | 125 |
| 二、实现区域经济政策转型 | 126 |
| 三、开展全方位区域合作，避免非均衡发展格局继续强化..... | 126 |
| 四、加快所有制调整 | 129 |
| 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把 GDP 从数量提升调整为质量提升 | 131 |
| 六、以优势特色产业提升产业结构须处理好几个关系 | 136 |
| 七、广泛吸收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经验 | 138 |
| 参考文献..... | 140 |
| 后 记..... | 152 |

第一章 我国所有制结构和企业成长的历史沿革与地区 GDP 水平变动

第一节 我国所有制结构的发展与变迁

我国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结构问题在改革开放以前，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建国初期至 1956 年，这期间中国的所有制结构是五种经济成分并存，包括全民所有制经济即国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农民和手工业的个体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五种经济成分共同参与市场公平竞争，都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在竞争中国民经济也得到了较快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是，1953 年开始的“一化三改”，使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的比重从 45: 55 变为 1957 年的 99: 1，国有资产遍及到各个行业和领域。第二阶段是 1956 至 1978 年，在这一阶段，为了使所有制能够“一大二公”，纯而又纯，政府对非公有制经济采取了“斩尽杀绝”的政策，使国有经济的比重增加到 80% 左右，而“准国有”性质的集体经济也从 1956 年的 9.9% 逐渐增加到 1978 年的 22.4%，其他经济成分则几乎绝迹。在这种单纯的公有制条件下，各种经济成分共存而产生的“鲶鱼效应”消失了，市场被人为地取消了，计划经济体制也随之加强和巩固起来，一大批国有企业在内无动力、外无压力的情况下，生产积极性不断递减，国民经济增长缓慢，人民生活状况 20 多年没有大的改善。据统计，到 1978 年，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国有经济占 56%，集体经济占 43%，非公有制经济仅占 1%。

1978 年改革之初，党和政府就是在这样一种基础上开始调整我国的所有制结构的。依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党和政府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对建国后长期奉行的经济管理体制和社会主义的认识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反思，对所有制结构进行了重大的调整，打破了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最终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

一、单一的所有制的形成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党和政府并没有在已有的生产关系基础上大力发展生产力，而是产生了“左”的错误思想影响下，在对所有制的问题上，不是以能否发展生产力为所有制结构是否合理的标准，而是热衷于追求“一大二公”的所有制，认为这才是所有制结构是否先进合理的标准。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只有全民所有制的国有经济才是惟一应该存在的所有制形式，其他经济形式都必须向全民所有制的国有经济转变，例如：个体经济应该转变为合作经济、小集体转变为大集体，劳动者的个体经济甚至被看作为资本主义尾巴，采取排挤打击政策。到 1957 年以后，只有以下三种所有制经济形式：1) 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国有经济。以上年工业总产值来看，1957 年全民所有制产值占 80%，1965 年占到 90%。全民所有制企业一律实行国有国营。2) 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这种所有制形式在农业中占有绝对优势。在工业中，以产值来看，1957 年占工业总产值的 19%，1965 年占 10%。3) 劳动者个体所有制。这种经济形式在农村只在一些极其偏僻的山区零星存在。在城镇，到 1961 年，个体经济的从业人员仅有 100 万人，其中手工业者 37 万人，小商小贩 60 余万人。直到 1978 年，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其基本态势是：在“左”的思想盛行时，所有制结构更趋单一，逐步形成“一大二公三纯”的单一公有制模式。

二、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发展模式的形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突破了“一大二公”的禁锢，提出要发展个体经济，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明确指出：“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从此，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探索社会主义社会新所有制理论，并在实践中尝试调整所有制结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种固定的模式，我们的任务是要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每一个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于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补充。”1978 年 10 月 17 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优势的根本前提下，实行各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长期并存，是我党的—项战略决策，决不是一种权宜之计。”这是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经济战线拨

乱反正中迈出的难能可贵的第一步，也是首次确认在社会主义社会可以长期实行多种所有制并存。

党的十二大进而指出：“由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总的来说还比较低，又很不平衡，在很长时期还需要多种经济形式同时并存。”“在农村，劳动人民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经济是主要经济形式。”“在农村和城市，都要鼓励劳动者个体经济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适当发展，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对于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是否影响社会主义性质这一重大问题，邓小平作了明确的回答，他说：“我们吸收外资，允许个体经济发展，不会影响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这一基本观点。相反地吸收外资也好，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也好，归根到底是要更有力地发展生产力，加强公有制经济。”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当今时代，邓小平强调要发展“三资”企业，他说：“发展一点个体经济，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欢迎中外合资合作，甚至欢迎外国独资到中国办工厂，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的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党的十三大首次把私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写入党的文件。

从实践来看，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不变，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形式，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是农村新型的社会主义合作经济，可以说是公有制新的实现形式。在城市，国营企业实行了扩权让利，利改税的改革，实际上也是探索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大胆尝试。可见，我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总结以前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重新恢复了解放思想，坚持生产力标准，突破了社会主义社会只能实行公有制的传统观念，使所有制改革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在继承和发展第一代领导集体对所有制结构探索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包括个体经济、“三资企业”经济、私营经济等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所有制结构模式。

三、多种所有制经济融合发展模式的形成

跨入 21 世纪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将出现新的变化：单一所有制的企业将减少，混合所有制经济不断涌现，逐步形成了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融合发展的新格局。

相对于原先的单一所有制结构，我们现在的所有制结构使劳动力与资本的结合更多地体现了技术构成的标准，因此带来了效率上的改进。国有企业的“减员增效”政策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这一含义。但所有制结构的演变不会停止它的步伐。目前，所有制结构的优化远没有实现。

改革开放初期，各种所有制形式之间基本上还是孤立地并存，每一种公有制都对应着国民经济的一块，整体的国民经济被不同的所有制分割成孤立的板块，

各板块之间各自独立，相互封闭。国家也根据不同的所有制板块，采取差别的经济政策和管理方法。这种板块式的结构本来就是有悖于市场本质的，但在渐进的改革的大背景下却产生了“积极”成果，即各种经济成分可以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下维持或孕育着各自的优势。国有经济占有“先入为主”的地位和享有优越的“政策禀赋”。在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支柱，无疑是国家重点扶持的对象，在资金、技术和原材料供给等方面享有特权。市场化改革启动以后，国有企业在技术和人才等方面仍然拥有优势。此外，国有企业仍然在市场准入、投融资方面享有政策优势。尽管国有经济的比较优势不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但它却是一种有利的竞争条件和一个客观事实。在转轨初期，维持这种优势成功地避免了国民经济产出的急剧下降。而体制外经济成分一开始就是市场导向的，它们具有灵活、高效的机制优势，在渐近改革的过程中，它们有机会显示机制上的优势弥补了增长的缺口，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得以维持。

但是，各板块之间机制上的摩擦决定了板块式的所有制结构注定是不稳定的。生产要素流动的本性一直冲击着所有制之间的壁垒。在彼此封闭状态下孕育的比较优势为所有制之间的联合创造了基础性的条件。混合所有制就是在追求优势互补的呼声中产生的。不同所有制在企业层次上谋求联合，尽管至今还没有形成主流，但却代表着所有制结构变化的趋势。

改革开放初期，混合所有制的发展受到原生所有制“短缺”的制约。因为当时，所有制结构单一，在城市几乎是单一的国民经济，在农村是单一的集体经济。所以，混合只能在国有经济与集体之间进行。20世纪80年代初期，混合所有制最具代表性的形式就是由城市国有经济与农村集体经济合办的“经济联合体”。好在原生的所有制不仅可以内生出来，而且还可以“引进”。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企业就是外资进入后形成的混合所有制企业。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经济成分的多样化为混合所有制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股份制这种资本的组织形式一旦用于国有企业的改制试验便不推而广。兼有股份制和合作制特征的股份合作制也在城乡大量涌现。混合所有制的蓬勃兴起预示着所有制之间的壁垒的突破，各种所有制经济之间的融合将不断深入。

第二节 企业成长的相关理论

一、新企业的起源

新企业的建立来自于创业者对创业机会的识别和使用。在新创企业的建立过程中，创业机会是使一个企业从创业者的脑海中的“想法”进化为一个正式注册并建立于市场中的起始原点，是新企业的起源。关于创业机会的研究主要有两

种观点，一种是由柯兹纳提出的，他认为创业机会之所以存在，是由于人们拥有不同信息。某些人知道一项新的技术发明，而另一些人知道在一个露天商场里面有一个店面是空的，正是由于人们拥有不同信息，使得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善于就一个具体的商业创意做出决策。由于拥有劣质信息的人做出了较差的决策，因而市场上的不足、多余和失误一直存在，以便让那些拥有优质信息的人做出更为准确的决策。

相反，熊彼特认为，真正有价值的创业机会来自于外部变化，这些变化可以使人们做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或使人们能够以更有价值的方式做事。熊彼特学派的研究者们明确了机会的来源，分别是技术变革、制度变革以及社会与人口的变化。技术变革是有价值的创业机会的最重要的来源，这些就会使创业者创建新企业成为可能。技术变革使人们能够以新的更有效率的方式来完成商业计划，技术变革程度的不同，可以带来不同的创业机会来源，技术变革的程度越大，带来的创业机会来源越大。制度变革也是创业机会的另一个重要来源。制度变革能够使创业者开发商业创意，使用新方法和路径使用资源，这些方法或者更有效率、或者将财富从一个人重新分配给另外的一些人。但是，制度变革与效率提高并不存在必然的正相关关系，研究者指出，某些类型的制度变革是创业机会特别有价值的来源。首先，放松管制使创业者更容易利用他们的新创意进入一些行业，从而成为有价值的机会来源。第二，支持特定类型商业活动的规定，可以鼓励创业者从事这些活动。第三，政府管制通过提供资源以增加对特定活动的需求或补助从事这些活动的企业的方式，成为机会的一个来源。社会和人口变化也是创业机会的重要来源，主要是因为社会和人口的变化改变了人们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同时社会和人口的变化使人们针对顾客需求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比目前能获得的方案更有效率。

创业机会存在于各种行业中，但是各种行业中创业机会的存量是存在明显差异的，因此，新企业的建立在各种不同的行业中存在区别，部分行业适合新企业的建立，但是有些行业则相对比较封闭，不适合新创企业的建立。一个行业是否适合新创企业的建立或者是否具有较大的创业机会存量，主要受到行业知识条件、行业需求条件、行业生命周期和行业结构的影响。有利于新企业的行业知识条件主要有三个特征：首先，具有更高研发强度的行业相对研发强度较低的行业更有利于新企业；第二，创新源越多的行业更有利于新企业；第三，在创新过程中更依赖于小企业的行业更有利于新企业。有利于新企业的行业需求条件特性也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行业的市场规模。经验研究表明，在较大市场中创立新企业的期望收益会比较大；第二，是行业的市场成长特性。新企业在成长较快的市场中的业绩比在成长较慢或萎缩的市场中的业绩更好；第三，新创企业更多的出现在分割更为细致的细分市场中。行业生命周期对于新创企业能否获得

成长也是至关重要的，处于青年期的行业比处于成熟期的行业更有利于新企业的成长和发展。市场中的各种行业在结构方面存在现在的差异，研究者们从行业结构的角度总结了有利于新企业的行业结构特征，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劳动密集型行业比资本密集型行业更有利于新企业的成长；第二，新企业不适于在广告密集型行业中生存和发展；第三，新企业更适应在分散性行业中生存与发展；第四，新企业更适于在平均规模更小的企业组成的行业中生存和发展。

二、企业成长理论

具体的企业成长理论研究视角具有深刻而广泛的跨学科性质，且种类繁多。从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76）的“斯密定理”、马歇尔（A. Marshal, 1890）对企业成长规律的阐述，以及吉布莱特（R. Gibrat, 1931）的吉布莱特定律，到贝恩（Bain, 1959）的企业绩效和成长的 S—C—P 分析范式、科斯（Coase, 1937）的企业的性质、波特（Porter, 1988）的企业市场力量与产业拓展、麦迪思（Madizes, 1999）的企业生命周期、潘罗斯（Penrose, 1964）的企业成长理论，再到安索夫（Ansoft）的企业成长经营活动之间的协同、钱德勒的企业经营结构与组织形式的匹配以及詹森（Jensen, 1976）等人的有关企业成长的契约联结模型。近几年国外有关与企业成长密切相关的成长理论研究显示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主要研究领域有企业成长与融资和法律制度安排、产业演化、技术和知识、转轨经济、信息披露和资本结构以及环境不确定性等六方面关系的研究（邬爱其，贾生华，2002）。随着企业生存环境的变化和相关经济理论研究的不断扩张，企业成长理论的研究内容日渐突出了企业成长的规模增长基础性、结构关联适应性、多重边界性和组织成长的生命周期性等特征，深刻体现了企业成长的质与量的互动性（邬爱其，贾生华，2003）。

有关企业成长理论的论文和书籍很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七个：美国密西根大学商学院教授诺尔·蒂奇的“企业 DNA 学说”，在皇家荷兰/壳牌集团公司供职 38 年的高级董事阿里德赫斯（Ariede Geus）著的《长寿企业》，彼得·圣吉（Peter M. Senge）的《第五项修炼》，爱迪斯（Ichak Adizes）的《企业生命周期》，巴斯金（Ken Baskin）的《公司 DNA—来自生物的启示》，柯林斯（Jim Collins）等著的《基业长青》，柯林斯（JimCollins）的《从优秀到卓越》。有关企业成长的数据也很多，在壳牌石油公司研究中，美国《财富》世界 500 强企业的平均寿命为 40~50 岁。其中，美国世界 500 强企业的平均寿命 40~42 岁；1000 强平均寿命只有 30 岁。在美国《财富》杂志的研究中，美国大约有 62% 的企业寿命不超过 5 年，只有 2% 的企业寿命超过 50 年。到 1983 年，1970 年的《财富》500 强企业有 1/3 已经销声匿迹。在北京中关村注册的 6000 家企业，寿命超过 8 年的不到 3%，平均寿命为 3.9 年。欧洲、日本公司的平均寿命为 12.5

年。英国工商部调查显示：1988—1993 年期间，将近 50% 的英国企业的寿命不超过 3 年。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 Donald Hicks 调查：1970 年以来到 2000 年，得克萨斯州企业的寿命缩短了 50%。美国中小企业成立后第一年倒闭的占新成立企业的 68%，存活 6~10 年的占 19%，超过 10 年的占 13%。全球约 80% 的企业寿命不超过 3 年，只有 10% 的企业寿命超过 8 年，只有 2% 的企业寿命超过 40 年，每年倒闭的企业约占原有企业总数的 20%~50%。此外，中国企业家杂志社调查显示：全球 500 强企业的平均寿命是 40~50 年；跨国公司的平均寿命是 11~12 年；中国集团公司的平均寿命是 7~8 年；中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是 2.9 年；中国企业的寿命是 8 年。

上述几种理论和几组数据所站的角度各不相同，但都强调一个信息：企业和生物一样，有一个从生长、发展到死亡的过程。当对那些长寿公司进行的研究发现长寿公司都有几个共同的特性：企业能够迅速适应环境的变化，不断根据环境调整行为；高度的凝聚力和认同感，企业文化建设卓有成效；高包容和分权想法，发动员工的自主性，鼓励创新；保守的财务策略，企业经营追求利润最大化。除了能不断地适应环境等几个共同特征外，企业从优秀到卓越、最终走向基业常青是不是有规律可循呢？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最近国内很多管理咨询公司流行着一种新的企业成长诊断模型引起笔者的注意。这个模型把企业成长分为初创、聚合、规范化、成熟、成熟后五个层次，企业在经历这五个层次时也将碰到领导、自主性、控制性、硬化等各种各样的危机，每个层次和每次危机对企业来说，既是一个发展的障碍，但同时也意味着一次走向长寿的机会。

三、企业的生命周期理论

企业生命周期理论起源于经济学对企业“黑匣子”生命现象的探索。对企业生死现象的观察，首先可以追溯到卡尔·马克思那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以古典政治经济学之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创造性地区分了“个别劳动时间”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由此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即商品价值是由生产该种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这个命题自然会引出生产者（企业）被淘汰出局的因果推论：如果一个生产者（企业）生产特定产品的“个别劳动时间”长期高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产品的“使用价值”就难以得到社会承认，价值就无法实现，价值补偿链条随之中断，无法进行再生产，因而最终会被淘汰出局。这个推论可以视为对企业生死因素的基础性分析。

微观经济学创始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Marshall, 1890），可谓系统观察与研究企业的第一位经济学家。在马歇尔看来，一国企业群体构成一个巨大的系统，犹如一片巨森林系统，大大小小的企业则如森林中参差不齐的树木，都有生存与成长的机会。与森林中的树木生态竞争系统一样，在一个竞争环境中，各个

企业都存在有凋零与枯萎乃至死亡的风险。与森林中新生的树木面临原有树木浓荫的遮挡一样，要长大，就得不断在竞争中获得空间。然而随着其生长壮大，也会逐渐失去生命力，竞争力下降，就会面临被淘汰的危险。但与森林一样，整个企业系统则正是在其内部企业间的竞争中得以不断更新，并保持勃勃生机的。马歇尔对企业系统的深邃洞察及其巧妙比喻，经后世企业研究者的提炼，被冠以“企业森林原理”的称谓。

明确的获利目标是企业存续的前提，为此，企业必须与外界不断地进行资源、能量和信息的交换。而且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的组织机构和分支机构会不断增加。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也时刻面临着挑战。企业发展的这些内在特征与生物所具有的特征非常相似。19世纪以来，这个特性逐渐被人们所认识，许多经济学家及管理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企业产生、成长及衰亡规律进行了研究。1972年，美国哈佛大学的葛瑞纳教授（Larry E. Greiner）在《组织成长的演变和变革》一文中，第一次提出了企业生命周期的概念。其后，美国学者伊查克·爱迪思（Ichak Adizes）从企业文化角度对企业生命周期进行了系统研究。1989年他的著作《企业生命周期》（Corporate Lifecycle: How and Why Corporate Grow and Die and What to Do About It）正式出版成为此后研究企业生命周期的经典之作。他在《企业生命周期》中明确了生命周期的概念，描述了企业生命周期各阶段的行为特征，并提出了预测、分析及诊断企业文化的工具（PAEI 和 CAPI），以及改变企业文化的爱迪思诊疗法。爱迪思认为，企业的成长与老化同生物体一样都是通过灵活性和可控性这两大因素之间的关系来表现的。灵活性与可控性决定了企业在生命周期中所处的位置。

与此同时，我国陈佳贵教授也进行了企业生命周期的研究，并提出了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他于1988年和1995年就企业生命周期问题发表了两篇专门论文。陈佳贵通过对正常发育型企业进行研究，探讨了企业成长各个阶段的主要特征，并专门对企业衰退期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企业进入衰退期后，存在两种前途：衰亡和蜕变。陈佳贵教授发展了日本学者藤芳诚一的蜕变理论，分析了衰亡和蜕变的本质区别，并重点对处于衰退期之后的企业各种蜕变进行了深入分析，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践价值。此后，谢科范教授（1999年）、胡继灵（2000年）和肖海林（2003年）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对企业生命周期进行了研究。任佩瑜教授（2003年）更是从复杂性科学的角度分析了企业生命周期的复杂过程，揭示了企业发展变化的内在机理。

企业生命周期模型假定组织经历孕育、成长、成熟、衰退或再发展等阶段。在孕育和早期成长阶段，企业产品单一（Scott, 1971）；创业者承担管理企业所有事务的责任（Adizes, 1989）。企业通常通过技术进步、创新或企业家精神而初具形态并获得市场利基（Greiner, 1972）。本阶段关键是获得安全的财务资源以确保

生存 (Adizes, 1979)，其实现方式是加班加点工作 (Greiner, 1972)、非正式沟通、简洁的组织结构 (Geiner, 1972)、集权和个性化领导风格 (Scott, 1971)。

成长阶段出现了快速扩张，企业能生产多种产品 (Scott, 1971)。企业规模的扩大和运作的复杂性对计时的要求不断提高 (Downs, 1967)，越来越强调建立规章制度和维持组织结构的稳定性 (Katz, 1978)，为确保企业生存创业者必须对下级授权 (Thain, 1969)。组织结构开始规范化、专业化和职能化 (Scott, 1971)，当企业成熟时，规章制度会使组织结构僵化，妨碍企业应变能力 (Lippitt, 1967)。制度化提高了企业早期发展阶段的稳定性，然而又降低了企业创新能力和灵活性，以及对未来动荡环境的适应能力，这会导致企业以后的衰落 (Peters, 1982)。为提高灵活性，可行的战略是：采用矩阵结构、健全信息系统、开发多种产品线、分权与多元化 (Scott, 1971)。

企业早期的成功会导致快速成长和扩张，这会使企业自大、不灵活、短视和文化僵化，从而进入衰退阶段 (Lorange, 1987)。企业内气氛的特征是盲目乐观、缺乏沟通、战略保守、群体思维和互不信任 (Adizes, 1989)。组织结构的僵化、对变革的抵制使企业不可能感知重要的环境变化，因而，组织结构、决策过程、信息管理程序会越来越不符合组织的需要。

衰退阶段之后，企业要么死亡，要么进入复苏和再发展阶段。如果企业能采取激烈的措施扭转局势，它将能继续生存下来。然而在许多案例中，企业战略方向的陡然转变是不可能的，除非高层管理者易位。对企业来说这常常是必要的，因为这可能带来新观念 (Nystrom, 1984)。如果企业不采取变革措施，只会进一步衰落，倒闭和破产是不可避免的。

表 1-1 企业生命周期模型比较

| 作者 | 所用术语 | 阶段数 | 阶段划分的依据 |
|-------------------|--------|-----|-------------------|
| Smith (1985) | 生命周期阶段 | 3 | 企业规模 |
| Downs (1967) | 发展阶段 | 3 | 组织结构复杂程度 |
| Scott (1971) | 成长阶段 | 3 | 组织结构复杂程度 |
| Steinmetz (1983) | 成长阶段 | 4 | 所有者对企业的控制方式 |
| Kazanijkun (1988) | 成长阶段 | 4 | 产品或技术的生命周期 |
| Timmons (1990) | 成长阶段 | 4 | 销售收入、企业年龄 |
| Greiner (1972) | 成长阶段 | 5 | 管理风格 |
| Mcgure (1963) | 成长阶段 | 5 | 经济增长阶段模型 |
| Galbarath (1982) | 生命周期阶段 | 5 | 针对高新技术 |
| Lewis (1983) | 发展阶段 | 5 | 管理风格、组织结构、战略、企业控制 |
| Rowe (1994) | 生命周期阶段 | 5 | 组织规模、管理风格 |
| Flambult (1990) | 成长阶段 | 7 | 企业规模 |
| Adizes (1989) | 生命周期阶段 | 10 | 实现企业目标、创新 |
| Qumn (1983) | 生命周期阶段 | 4 | 管理风格、组织结构 |

第三节 我国主要地区 GDP 发展历程

一、首都经济圈 GDP 发展历程

(一) 首都经济圈形成概况

首都城市圈的概念在中国城市化历史上并不是一个新名词。在中国的封建皇朝，国都周围地区一般被划为“京畿”，并直接由主管京师的官员管治。此范围内，许多城镇作为京师的防卫及物资供应基地。周初，燕的国都蓟城就拥有一个四周的辅助城市圈，实质上形成了一个首都城市圈；自辽代起北京成为全国国都，至清代，其首都圈越来越大，在清代逐渐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的，半径为 300~400 公里的城市群，包括了许多重要城市如保定、天津、唐山、秦皇岛、承德和张家口等。这些城镇有其特别功能（政治、军事、经济、交通）以支援服务首都，使其得以发挥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作用。天津在京畿地区中与北京的关系最为密切，它是由南中国经大运河运粮食以济京师的漕运中心，也为京师提供鱼和盐这两种主要食品；又是京师的交通和贸易城市、军事重镇，也是海上的南北洋航线、内河的大运河航线及海河水系航线的汇集点。唐山是作为京津二市的原材料基地而发展起来的，主要为京津提供煤炭和建筑材料，随着其工业门类的增加，综合经济实力有所增强，并进一步加强了与京津的经济联系。保定长期为直隶省会，是重要军事防卫地区，因建有许多著名书院成为京畿的次文化中心，同时，她还是北京农副产品的的重要供应基地。张家口为京津北部军事屏障和通往蒙古高原的重要通道，是拱卫北方的军事要卫。同时亦是个农贸城市：既是农牧产品的集散地，还是中俄贸易的重要场所。承德是京师政治分中心，北京的副都，是皇室夏天避暑之所。秦皇岛是京津的能源补给基地和辅助性港口（近代以来），是首都的第二通海通道。

根据经济联系的紧密程度，参照首都圈历史，中国首都经济圈界定在以下范围内，即包括北京、天津、廊坊、保定、唐山、秦皇岛、沧州、张家口、承德等。内圈主要是由北京、天津、廊坊、保定、唐山、秦皇岛六市组成；外圈包括承德、张家口、沧州三市。总面积 168,739 平方公里，1999 年人口约 5898.28 万，人口密度约 350 人/平方公里；国内生产总值 6500 亿元，人均 11020 元；三次产业结构为：11: 44: 45。

(二) 首都经济圈中京津地区 GDP 发展历程

首都经济圈中心城市是北京市和天津市，北京市与天津市的 GDP 发展历程